

## 【论 文】

# 苏联解体 20 周年：改革即“去苏联化”

沈志华 左凤荣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 1991 后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主义国家，苏联曾对 20 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 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现今的俄罗斯选择了另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之路，正在探索如何在民主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去斯大林化，进一步消除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官僚主义等。在中国，我们研究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

### 一、中国学术界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很重视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出版了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苏联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学术界更重视利用解密的档案探究苏联方方面面的问题。在 2002 年出版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共有 34 卷；2007 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共有 5 卷之多。在利用新史料的基础上出版了《中苏关系史纲》、《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中下）、《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中下），把苏联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专家们费时多年撰写的九卷本《苏联历史》也将陆续问世，关于苏联的档案文献仍在不断搜集整理和翻译之中。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弄清历史事实，少了许多苏联解体初期研究中急于找到答案的功利主义色彩。

苏联的剧变与解体是个复杂的问题，苏联的体制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并欲取而代之。70 多年实践的结果是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不复存在，在原苏联土地上的国家基本上都选择了多党民主、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角度认识和研究苏联，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不奉迎、不跟风、脚踏实地，对研究苏联问题尤其重要。

### 二、苏联剧变的根源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 1929 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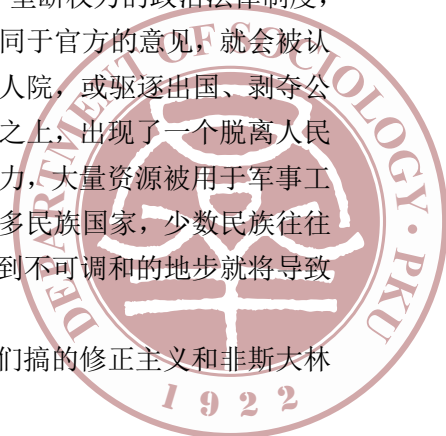
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原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把斯大林搞大清洗，滥杀无辜，说成是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甚至还制造了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大多数俄罗斯人向往回到苏联的神话。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不顾工人的生活条件搞工业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剧变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的力量、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滑，进而发展成危机和负增长，是苏联体制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都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勃列日涅夫甚至重新搞斯大林化，这正是导致苏联出现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苏联的瓦解中苏联共产党负有重要责任，苏共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引起多大反响。苏共则不同，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苏联唯一的政党。由于缺少监督和制约，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领导干部思想僵化，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只重强国，不知富民。苏共创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体制和制度又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有人把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菲斯大林



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人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方针的失当，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应忘记的是，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试图解决苏联经济下滑、人民与政权分离、社会精神萎靡的问题，但他所选择的“反酗酒斗争”、“加速战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都犯了战略性错误，并非对症下药，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危机，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

苏联改革的失败与政策选择失当相关，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确实难以改革。在苏联这一体制已经运行了 70 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一整套思想观念和强大的支柱——特权阶层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代表。掌权者对改革的抵制和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苏共内部保守势力和激进改革派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在苏共解散、社会主义瓦解之时，共产党员们没有为此举行任何抗议活动，这说明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苏联的剧变也说明，不为人民谋利益的制度不可能长久。

###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使苏联民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学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共产党首先尊重群众的实践，承认了群众所创造的联产承包制的合理性，并不断完善这一做法。在改革政策的选择上，只要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政策，我们就实行，不再用苏联式的教条衡量其是否合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计划与市场的教条，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国曾经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重复犯了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